

革命史資料

12



《革命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成员

主任：何长工

副主任：孙毅 杨放之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刘景范 刘瑞龙

刘 苏 刘立青 连 贯 侯 政 温济泽

黄鼎臣 魏传统 蹇先任

革命史资料

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国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1983年6月第一版·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7³/₈ 字数：162,000

印数：1—9,900册 定价：0.83元

统一书号：11224·120

目 录

春雨前奏

——记“绥远方式”之一……裴周玉（1）

和平合作

——记“绥远方式”之二……裴周玉（23）

蒋牢追忆……梁蔼然（35）

从八条枪开始……蔡斯烈（57）

迷途知返

——汪伪空军扬州起义…于飞 何健生（105）

徒手夺敌机……李传根（125）

第一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张智理（129）

首任曲阳……潘振武（137）

战斗在大青山……饶 兴（145）

人 物

熊雄同志生平……熊巢生（156）

姚喆同志战斗的一生……包盛标（166）

怀念刘桂云烈士……………廖鼎祥（190）

关于十九路军的史料

我党与十九路军合作情况……………

符玉玲 薛宗耀 方长明（207）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处理福建事变中的
错误纪实……………林蕴晖（223）

春 雨 前 奏

——记“绥远方式”之一

裴 周 玉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现内蒙的西部地区）问题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我们与傅作义、董其武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从而，使八万余众的国民党军队举行了起义，脱离了南京反动政府，和平解决了绥远，广大人民获得了新生。

贯彻执行“绥远方式”，当时我们是陌生的，既不理解其精神实质，也弄不清采取这种方式的理由，只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结合实际，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通过和平合作、团结改造、改编整训等工作，将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三兵团，并于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开出绥远。同年九月三日，这支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出朝作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证明他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

一、“绥远方式”的由来

四九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敌我双方的力

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再也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正摇摇欲坠，扼守在绥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孤立据点，想逃既无路，欲战又不能。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傅、董军各派的政治态度、绥远地区的阶级关系，及时提出了“绥远方式”——即用和平谈判，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争取这支国民党军队投奔到人民阵营来。

绥远位于现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原有二百万人口，是傅先生苦心经营多年，用以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基地。傅作义先生一九三三年曾在长城和百灵庙率部英勇抗击了日寇的入侵，抗日战争初期，又参加了察北、忻口、太原战役。傅先生同我党有过一段光荣合作的历史。四一年，他在河套地区击退了日寇对五原的进攻，收复了“河套”，并在该地区坚持了八年抗战。但在蒋介石“保存实力，坐收渔利，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下，不能发挥他抗战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同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又有过两、三年的悲痛历史，所以绥远广大人民对傅军有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和仇恨心里，为解决绥远问题增加了工作的困难。但绥远的军政主要首脑多属傅先生的亲信，对他的旨意大都能言听计从。所以，解决绥远问题的关键人物仍是傅先生，也是“解铃还要系铃人”的道理所在。

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现呼和浩特市）指挥所主任兼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将军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先生是一位饱经世故，没有完全沾染国民党反动派恶习的正直将领。他不是富家纨绔子弟出身，更不是蒋介石黄埔嫡系和亲信。他从营、团长提升为师、军长，最后擢升为绥远军政最高统帅，都是傅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为傅先生供职几十年，一贯肝脑涂地，和傅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董先生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卖

国求荣，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曾有过不满，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极表关注。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董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考虑绥远的前途问题。他曾设想：一种是同共产党对抗到底，决定断送一切，人民也会遭受涂炭；一种是带领部队西逃宁夏或青海，最后必以失败而告终；再一种，走人民的道路，得到共产党的谅解。像他这样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谨慎考虑各种前途，征询亲信的意见，是一种正常现象。当他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从广播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对傅先生选择人民的道路极表同情，但也忧心忡忡，疑虑不安，“绥远该如何办呢”？于是，他在第二天上午乘专机到北平向傅先生请示绥远问题事宜。傅先生同他畅谈了自己交出北平的经过和绥远今后的打算，并要求董先生安定部队情绪，稳定绥远形势，等待指示。从此，董先生逐渐明确和坚定了走人民道路的决心，为实现“绥远方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政治不纯。根据一九四九年底绥远指挥所的统计是：八万六千余人，（不含家属小孩和北平遣送回绥远的军官）共十六个师旅，几十个保安团队。其组成是：第一、董先生的基本部队五、六个师旅，约三万多人。其中主力是独立第七师八、九千人，装备良好，战斗力较强，是原来对付解放军的一张王牌。这些部队的主要将领都是傅、董先生的亲信，是支持和拥护走人民道路的主要支柱。第二、原属西北邓宝珊部队二十军的两个师，约一万多人，这是被蒋介石排斥与西北野战军的压力下挺进绥远“避难”的。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以及邓宝珊先生弃暗投明的举动，这个军按照邓宝珊先生的旨意，积极支援绥远起义，成为董先生稳定绥远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地方杂

牌部队约六、七个师旅，两万多人。他们有的是占山为王的老土匪，有的是日本的皇协军，有的是地主武装还乡团，例如苏美龙、郭长清的部队，阎锡山的旧部，张朴的第三一九师，地主武装乔汉魁的独立骑兵第三旅，察北专员兼保安司令李维业的保安旅，以及各县，旗的保安团队与蒙族王爷的半军半民的武装等。这些部队的一些领导人，生活腐败、无所不为，心怀鬼胎、明争暗斗，纪律败坏。群众称他们“兵匪不分”“日抢夜劫”，这是起义的一大阻力。

第四、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孙兰峰率领由张家口逃来绥远的残部，刘万春的一百一十一军的一部和鄂友三的骑兵整编十二旅等约一万人。他们积极投靠蒋介石，坚决反对起义，是阻碍和平解放绥远，造成混乱的最大障碍。这些足以证明部队内部的复杂性，起义的组织工作之困难，没有一定的时间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必然“欲速不达”，甚至还会造成绥远一时的混乱局面，增加人民的痛苦。

我党在绥远也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和牢固的基础，这是正确解决绥远问题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一九二四年起，我党就有一批共产党员——乌兰夫、奎壁等同志在此地区开展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王若飞同志等人又进入绥远，恢复了党的工作。他们坚决支持长城和百灵庙抗战，积极组织伊克昭盟锡尼喇嘛领导的第十二团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七七”事变后，党中央派出一些同志参加了傅作义部队的抗战。陕北三边特派部队与干部深入伊克昭盟开展工作。三七年秋，山西党组织派赵中池、刘华香等同志十余人的工作组，带着电台，开赴雁北与绥远边境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年底，八路军一二〇师派出三个武装工作团，深入雁北，绥远东部进行抗日武装活动。当时我是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锄奸科长（即保卫科长），带工作团三十余人在左

云、大同、丰镇、凉城地区开展工作到三八年秋，组织了近千人的游击队，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同时绥远的各界开明人士，进步学生和各族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如：以云长胜为队长，杨植霖为政委的绥远“抗日团”，积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根据地，抗击了日寇，后来改编为绥蒙游击大队。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九月派出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同志，率领七一五团一部分同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同志挺进绥远境内，在大青山、蛮汉山以及绥东地区创造了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了七、八个县政府，扩大成几千人的抗日武装，曾攻占过陶林县、乌兰花（现改为四子王旗），广汉营、天城等重镇，歼灭了固守这些城镇的日伪军，多次粉碎日伪军几千人到三万余人的扫荡。一九四〇年一月和四月份，当日寇进攻“河套”的傅作义部队和傅先生反攻驱逐五原的日寇时，我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两次都派出部队袭击日寇，攻克毕克齐车站敌据点，破坏了归绥至包头、归绥至集宁的铁路十几公里，电话线几十公里，有力地支援了傅军的作战。在敌人残酷扫荡、“三光政策”的威逼下，我主力部队和机关暂时撤离了大青山，留下的部队，包括姚喆司令员在内都分散在群众中和山沟、丛林里，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风餐露宿，坚持同敌人周旋。在抗日战争中，不仅蒙、回、汉人民拥护我们，积极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为我军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就连许多开明的地主、绅士、牧师、蒙族王爷、回族阿訇、“会道门”和“青红帮”的上层人物，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也拥护与参加了抗战，为我军掩护伤员，购买医药与军用物资，捐献马匹、粮草等。在绥远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逐步发展为三个

骑兵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独立团，约三万余人的武装力量。千千万万蒙、汉、回族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地委书记王聚德、专员程仲一等同志，为绥远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说，绥远广大人民经历过严峻的斗争，同我党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他们热烈地盼望着绥远早日解放，拥护我党的和平解决绥远的主张，是实现“绥远方式”的重要的群众基础。

二、我党对绥远的方针

“绥远方式”是毛主席、党中央为加速全国解放，提出的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概括地说，就是放宽政策，拉长时间，等待觉悟，和平合作。毛主席曾向傅先生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对绥远就手软了，不好用兵再打了。三月份毛主席告诉傅先生：“绥远问题，划分一个临时停战分界线，让董先生做好绥远内部工作，他认为适当时候再举行起义。”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这一方针，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同志从河北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特到绥远向第八军（八纵队三月奉命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八军）传达全会精神。李政委乘火车于三月十九日来到卓资山（现为卓资县）第八军军部。三月二十日在第八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李井泉政委作了报告。他就二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毛主席的重要报告和党中央对贯彻执行“绥远方式”的问题作了

详细的阐述,其中提出了五个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有利条件:第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能否顺利解决绥远问题的关键;第二,我们有了组织改造高树勋、吴化文和曾泽生部队的经验,只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研究新的情况,就能顺利解决问题;第三,绥远的地理对我有利,兰州解放后,他要逃走也难以达到目的;第四,绥远广大群众与傅先生内部,包括董先生为首的多数军官与士兵,都有希望和平的愿望;第五,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决定绥远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学习全会精神中,大家明确了中央提出“绥远方式”的战略意图,解决了几种不同的思想反映。一种是强烈的求战情绪;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特别是我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一月二十八日在旗下营经过两小时战斗,击溃董军一个团,俘敌七百余人,解放了归绥以东三十里的广大地区后,求战情绪更高了,总想一举攻打下去,占领归绥城。部队后移时,有的同志流着热泪说:“到嘴边的肥肉吃不上,立功的机会没有了。”一种是骄傲情绪;有的说:“对惊弓之鸟,丧家之犬,一击即溃的敌人,领导上还右倾、怕死吗?”再一种,是急躁情绪;有的说:“董其武这个绥远人民的仇敌、太上皇、土皇帝,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对董军还在抢占地盘,袭击我们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表示强烈的不满,甚至气愤地说道:“这不是把过去流血牺牲的光荣历史白白地断送了吗?”通过学习讨论,使同志们扩大了思想眼界,提高了胜利信心和对党的统一战线的认识,消除了执行“绥远方式”的抵触情绪和关门主义思想。大家说:“绥远方式”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胸怀和战略部署。

根据党的战略方针与军委命令,一直在前线同董军打交道的西

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在一月三十日就奉命停止了向董军的一切军事进攻，二月十一日又奉命将我纵队的主力，由旗下营后撤六十里到卓资山整训，以减轻董军压力，拉住董军，使其不能西逃。同时我们在部队中开始广泛进行统一战线教育，取消以报刊揭露董方过去恶习的方法，允许董方群众、军人自由到解放区来往和通商，并奉命停止瓦解董军和组织董军哗变的活动，改董军为友军称号（过去称敌军），以争取缓和双方的敌对情绪，促进绥远形势的好转。

三、绥远秘密谈判时期

四九年一月至三月是由四野指挥员直接同傅先生的代表洽谈。北平和平谈判时，我方提出绥远问题同北平问题一起解决，以缩短解放华北的时间，减少绥远人民的痛苦。而傅方代表认为，“绥远条件还不成熟，暂维持原状。”但是双方都有和平的愿望，所以四野的代表同傅先生的代表，一直继续保持着接触。由于各种原因，谈判的距离较大，未达成一致意见。我方在解放斗争的胜利形势下，求之过急，而傅方不少人存有幻想，提出的条件也过高，加上绥远内部阻碍反对和平的势力还很强，蒋介石与西北的马鸿逵不断对绥远施加政治压力，暗里进行引诱拉拢，所以，致使绥远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

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八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党中央直接领导掌握着这一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虽然日理万机，可还是集中了很大精力，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解决“绥远问题”。毛主席曾先后七次找傅先生谈话，其中有一次整整谈了一天一晚上。他耐心地向傅作义说明了各种问题，征询了傅先生对时局、对国家的看法，并对他提出的问题，逐个进行了解答。毛主席

鼓励他要识大体，顾大局，将绥远问题尽快和平解决，以便为全国做出好的榜样。最后，傅先生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所阐述的一切观点，坚决走人民的道路。周副主席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绥远方式”的指示，曾亲自处理傅先生提出的具体事宜，例如，傅先生请求派一批他的将领回绥远，其中有张家口战役中被我方俘虏的一批高级将领——袁庆荣军长、冯梓师长及北平和平解放的军长安春山、副军长卫景林、王建业等几十名师以上军官，都是周副主席批准派回绥远的。这些被派回绥远的将领，在协助董先生组织起义，实现解放军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我党对这些有过贡献的同志也未一脚踢开，而是根据傅、董先生的建议，对他们的工作都做了妥善安排。

为具体协商绥远问题，党中央决定双方各选派三名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我方派出代表李井泉同志（晋绥军区政委），张友渔同志（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潘纪文同志（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傅方代表王克俊先生（原华北“剿总”政训处长）、周兆峰先生（原绥远厅长）、阎友文先生（原《奋斗日报》社总编），在北平谈判绥远问题。由于傅、董方面拿不出划定停战分界线的方案，在划分临时分界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故谈判进展不快。因此，绥远问题，既不能很快解决，也不会决裂，既要允许傅先生与董先生有时间去做反对派将领的工作，又要等待解放战争取得全部胜利，绥远问题才能妥善解决。周恩来副主席曾向我们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性急，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应理解他们的爱国心愿：他们希望和平解决的思想是主导的，但也有幻想、顾虑，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有许多是我们不理解、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想法，我们应该积极、耐心地去进行工作，等待他们的觉悟，否则就不成

为绥远方式。直至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四月二十六日双方又继续进行谈判。谈判中，因军费（其中每月要发二十三万元现大洋）、划分各自管辖地区的临时分界线、伪金元券兑换、在天津开设贸易机构等问题，洽商几天又未达成协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知悉谈判情况后，即命令我方代表全部同意傅方提出的条款，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其大意是：停止敌对行动，划定解放军与绥远部队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与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来往、货币兑换和文化交流，归绥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及华北政府联络办事处等条款。

“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在北平达成后，须要得到绥远当局的同意和支持，因此傅先生即派原一〇四军安春山军长、原办公室主任刘庸笙先生，携带“协议”（草案）与傅先生的面谕赴绥远。董先生接到“协议”条文后，分别召集军队和地方首脑传达了傅先生的指示，征求对“协议”的意见。虽然多数人对“协议”表示赞成和拥护，但也有少数人以“现在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拒绝对“协议”表态，有的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企图否定“协议”全文，有的谩骂“协议”是投降书，还声言以武装进行威胁。经过董先生的耐心工作，逐步消除了不满情绪，通过了“协议”条款。尔后，董先生将修改“协议”草案的意见汇集成文，派原绥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先生送到北平交傅先生。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收到“协议”后，马上批准了“协议”全文，并同聂荣臻、薄一波同志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先生。毛主席说：“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要求照‘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最后，毛主席强调：“绥远过渡时期宜短不宜长，（即“协议”签定到公开

起义），否则，湖南的起义与新疆的起义都要走在前头。”（湖南程潜、陈明仁，八月四日起义；新疆陶峙岳、包尔汉，九月二十五日起义）至此，双方于六月八日正式达成“绥远和平协议”，使绥远和平迈出了第一步。

为了适应绥远新的形势，中央决定将绥蒙地区（即原绥远与内蒙的简称）改名为绥远省，原绥蒙政府改名为绥远省政府，杨植霖仍任主席，奎璧任副主席。取消原野战军第八军番号，将八军同原绥蒙军区合编为绥远省军区，姚喆任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八军同军区合编后，转驻集宁城之桥西。从此，军区部队全部撤到集宁附近，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积极准备迎接绥远的和平解放。

四、两种势力的争夺斗争

绥远问题是党依靠傅作义、董其武先生为首的进步势力同蒋介石、军统特务，顽固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激烈的争夺。

在这场斗争中，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绥远方式”这种形式，党中央的具体指导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绥远党委动员了全党、全军、各族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思想工作，克服各种阻力，保证贯彻执行了中央对绥远的方针政策。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理解“绥远方式”的精神实质，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要用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这种思想上的急转弯，必然遇到非常强烈的反响与思想障碍。而这种思想在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更为突出，因为他们长期同董军作战，流过鲜血，部队报仇雪恨之心非常迫切，要求强烈。特别在庆

祝北平解放的胜利呼声中，他们突然接到军委命令：“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进攻”，部队后撤几十公里，并撤出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许多村镇，包括草原重镇——乌兰花（现为四子王旗），怎能不叫大家产生疑问呢？八月底，党中央派傅作义、邓宝珊先生赴绥远的消息传开后，各方都引起强烈反响，存有关门主义思想的人，都以不信任的态度说：“派傅先生去归绥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绥远省委和军区党委为此曾专门开会分析绥远形势，认为傅去绥远不外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傅到绥远后逃去广州（蒋介石在广州），这是蒋介石所希望的，即“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傅先生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二种，他以绥远为据点，保持同我方不战不和，分庭抗礼的局面，这不可能实现。第三种，傅把绥远这些力量做为入股的资本，同我讲价钱，闹别扭，拖延绥远问题的解决，这种可能性也很小。我们还同时分析了归绥方面董其武先生存在的问题，认为他有四怕：一怕解放军向他们发动袭击（初期）；二怕绥远的顽固反动分子向解放军挑起事端，或发生意外，于己不利；三怕蒋介石停止军饷和供应，造成军队生活困难，军心动乱；四怕军统特务捣乱破坏和平起义。并分析了我们干部中的思想情绪，大家认为主要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关门主义思想。只有用说服教育与毛主席教导，才能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经过学习，大家提高认识后，明确了绥远和平解放的工作步骤是：首先，争取以董其武将军为首脑的军政各界上层人物向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反美反蒋斗争。这是实现绥远解放区化和部队解放军化的根本前提。其次，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绥远成立军政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而不是一党包办。再者，合并绥远的军、政领导机关，取消国民党部及一切特务组织，

但董先生的侦察、情报，军宪和政工处等组织的人员例外。最后，由董先生将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队、土匪、还乡团、特务等武装，改编成解放军的三个军，七个师，三个旅。另外，我们要动员绥远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董先生的起义，宣传董先生的进步措施，对于顽固反动分子，包括军统中统特务，罪恶累累的鄂友三、乔汉魁、张朴等军官（师长）在内，只要参加起义，诚心与我们合作，就一律按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

元月下旬，停止组织董军哗变的指示下达后，说服地下工作人员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他们长期埋伏，出生入死地在敌人内部进行秘密工作，在全国大好形势下，倾向与接受我们工作的对象、要求立功赎罪的特务、警宪人员，与愿意投奔人民怀抱的军官人数与日增多，现在，立即要他们放弃这种“功亏一篑”的工作，全力转向团结与巩固董军，支持绥远整体起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如这时正值我地下工作者组织董军步兵九三九团（原保安四团）在团长魏岗、副团长刘金声同志率领下，于三月初举行起义（哗变），将部队从归绥拉到绥南地区，而魏岗同志亲自找到解放区，要求派军队接应，并允许开进解放区。但我们还是坚决执行停止组织董军哗变的指示，并没有派部队前去接应，也没有允许进入解放区，促使这个团不得不停留在解放区边境达数天之久，最后，使部队开回了归绥，该团起义宣告失败。

我们为履行“绥远和平协议”，我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进驻归绥，其任务是：协助董先生贯彻执行“协议”条款，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各界进步人士，各族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发展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蒋介石、阎锡山的特务。但联络处未能按时进驻归绥，其原